

爱家李咏还原本我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梁 昆 通讯员 李 冰

日前,央视主持人李咏推出自己第一部纪实传记体图书《咏远有李》。书中以极具李氏风格的幽默语言道出了李咏绕不开的经历。从恶童出世到热血青年,从怀才不遇,到《幸运 52》的从天而降,再到《非常 6+1》《梦想中国》《咏乐汇》的异军突起,令读者近距离透过他的眼睛看待这个围绕在他周围的外在世界。近日,李咏接受了海南日报记者电话采访。

写书治好了忧郁症

海南周刊:据说这本书准备了 8 年?
李咏:这本书实际上是 40 年。他们忽悠我,忽悠了 8 年,绷不住了,6 瓶青花瓷二锅头啊,晕了,就应了。应了的事就得办。

海南周刊:你在书的开端就说自己食言了,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打破自己“不写书”的誓言呢?

李咏:我不愿意写书,说话还行,就怕码字。后来想,40 岁了,应该给自己留下个记忆。家庭幸福,孩子也长大了,父母还好。所以我给自己准备了一个生日礼物。

海南周刊:你觉得值吗?有收获吗?

李咏:值,获得了解脱,再熬下去我就成病人了。普通的城市平民,大家心里都有点问题,倾诉是一个很好的方式。我光找我老婆倾诉没用,找不认识的人倾诉人家以为我有病。所以我写出来,倾诉给好多多人,一块块板砖、一把把菜刀扔过来,我都准备接招。我的心态变得非常好了。

海南周刊:听说,哈文(李咏妻)认为写书最重要的是治好了你的忧郁症?

李咏:我最近知道了一个新名词,叫作“阴天忧郁症”。关起窗帘睡觉,一睁眼我就知道外面是阴天还是晴天,阴天我就萎靡不振,晴天就什么事都没有。现在好了。

随性抖出“有理”包袱

海南周刊:《咏远有李》这个书名特别有意思,是你自己起的吗?

李咏:我就是想起这个名,每件事我都觉得自己做得对。书名《咏远有李》读起来听起来特别不讲道理。但我最推崇的就是林语堂在《生活的艺术》里说的“关键是两个字:讲理。”

海南周刊:谈谈这本书的风格路线吧?

李咏:是我在生活中的,非常随意、随

央视主持人李咏,红极多年,风头不减,曾经发誓“不出书”,而今却决定高调推出自传。原因很简单,“就想在四十不惑的时候留点儿自己的东西。”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,李咏道出了一切绕不开的经历、感悟、感恩,当然还有绕不开的痛苦和牢骚,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俗人李咏。



《咏远有李》李咏著
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9 年 11 月

性,会抖小包袱,但不敢抖太多,太多就成笑话了。但笑过之后我会有意做小小总结,才符合“有理”。

海南周刊:你平时有阅读的习惯吧,印象最深的是哪些?

李咏:尼采。可以说他有励志的一面,有内心消沉的一面,他在挣扎。我在他的书里面得到一些东西,还有一部分,我不想掩饰,那时在大学里你不读尼采,不读叔本华,你就边儿去,你不是潮人。我现在读的都是杂书,包括《包容的智慧——刘长乐和星云大师的对话》之类的。

生活“快乐并痛着”

海南周刊:主持人出书早就不是新鲜

事了,你的书最大的特色在哪?

李咏:我不大谈工作,工作是小事,我主要谈家庭。我可能跟别人不大一样,就是我把家事扩得比较大。

在很多人眼里,我很风光。只有我自己知道,生活其实是‘快乐并痛着’。我获得过许多成就,许多首肯,许多认可。但我又哪儿哪都疼。

海南周刊:在书中你有颇多妙语,譬如“老婆是塑料花,永不凋谢”,“成熟的稻子总弯腰”。在书中你也说过,只要给自己土壤就可以娱乐至死,动力在哪?

李咏:没动力,是努力。

海南周刊:你在书中没写到业余的爱好,你是工作狂吗?

李咏:您期待第二部吧,我专门写。

成功男人背后的两个女人

海南周刊:你提到是被酒灌晕写的,是不是有什么事让你有真正的触动,决定写书并且起这样一个书名?

李咏:青花瓷只是个刺激。从前我听一个作演员的朋友说,不写字,怕脏了读者的眼。我也坚信这一点,但这个演员拍广告了,那我凭什么不码字呢?他拍广告挣钱,我码字治病。哈文是我的把关者,如果她不把关,这本书挺要命的。

海南周刊:你在夫人怀孕的时候写的宝宝日记很感人。竖排、繁体、蝇头小楷,文字写得很震撼呀?

李咏:我每天一篇,不管多晚。

海南周刊:现在还坚持吗?

李咏:当我女儿呱呱落地的那一瞬间,我就写不下去了,她就是我想要的那一个,我还期待什么呢?

海南周刊:你在书中写她不喜欢女嘉宾拥抱你,一看就关电视,现在呢?

李咏:她现在不关电视了,看《咏乐汇》时看我和女嘉宾聊天,她说不要再请她了,容易搞外遇啊。她妈妈在外面都听傻了。电视对孩子的影响非常糟糕。她把韩剧都看得清清楚楚,所以我严格控制她看电视。

海南周刊:家里的女儿和老婆两个女人哪个更重要?

李咏:你让我怎么分呢?俩都重要,我谁都离不开。但看到她们在我身边熟睡时,我感非常安慰,女儿是我的情人,我的夫人是我的真情人。



《好儿女花》虹影著
江苏人民出版社
二〇〇九年九月

在个人史的描述里,最大胆的不是夸大自己的过去。不是将往事涂上铁锈,以突出自己当年的辛酸异常;也不是将自己的小聪明拼命地修饰,直接通过丰富的词语嫁接出灿烂的传奇。最大胆的书写是忠于自己的个人史。

流离在国境之外多年的虹影,一直在用一枝大笔记述她的个人史,笔墨大胆之至。

那些文字从母亲的个人史出发,那琐碎又疼痛的生活,被时间晒干成一声又一声叹息。

虹影是私生女,母亲一生有过多个男人。这使得母亲有了丰富的矿藏。在那样一个意识形态紧绷的时代,虹影目睹了母亲全部的演出。那关乎伦理与欲望的细节成了她以后创作的矿藏,她前期的文字,无论是气息还是词句,都是从母亲的河里打捞出来的。

《好儿女花》也是如此,开头便是母亲的死。她从北京坐飞机往重庆赶,然而,不论她如何追逐,也没有追上母亲的远去。

媒体报道此书时,以小说论,大约也是作者的意思。但我看不到小说的模样。整部作品,从开始到结束,再到中间的插叙,都不过是散文常用的手段。

散文并不拒绝局部的修饰。完全照搬生活的写作几乎无法进行,哪怕是日记,也不过是对生活局部的截取。真相在时间的流水里融化,过后的叙述,只能无限接近,却无法抵达。

好儿女花是一种常见的花朵,在我的乡下,这种花大约是用来染指甲的。在虹影的乡下,这种花有着和她母亲身世接近的名字,又叫作“小桃红”。虹影用一个近乎风月的花朵名字暗喻了她的母亲,这是一种大胆。虹影在作品中写到生活窘迫时自己的模样,这依旧是一种大胆。最为大胆的,是她用录音笔一样的笔调记录了世俗情状下的兄妹感情、母女之情以及让人难以想象的底层生活秩序。

虹影在作品中塑造出来的大姐,荒唐而真实,自私而又热情。小姐姐跋涉在一条没有方向的婚姻岔路口。虹影的大胆不是极端地缩小人性的恶又或者适度地夸大了人性的善。没有,她的大胆用在了对生活的真实着色上。

我一直把此作品当成散文读,读到母亲出殡的时候,内心大恸。在房间里来回踱步,不能再接续下去。虹影在《好儿女花》里的文笔简短、坚硬,让我想到明清笔记小说。之前,我看到的她的文字是柔软的、诗意,这样对语言的选择,让我想到她对婚姻的舍弃。诗意遇到盐,遇到泥泞的乡村世界里的母亲,遇到旧时的自己,便显得多余和小气。

虹影的好在于,她只是记录下那些话语,平淡接受的姿势让人动容不已。她没有气愤地在作品里的辩解,她没有半点矫情。

这种喜欢充满了油烟味道,又充满了传奇色彩。这种喜欢怎么可能被人理解。

在这部长篇散文里,处处散发着虹影对母亲的依赖。除了食物、旧时风物和习俗。还有无法考证的一些传说。譬如,她写她母亲的项链被抢了去,自己做主,将结婚的戒指送给了母亲。她的原话是这样的:“我怎么可能把结婚戒指给人,即便这人是母亲,也不能。迷信一些的话,婚戒掉了,就是婚姻丢了,我把自己的婚姻丢了,这能怪得着他吗?”

近些年,越来越觉得世事的模糊和不可言说。越来越鄙薄的越不能用清晰的词语去概括,越是漂亮的清洁的东西,却觉得那些东西里透出一个假字。

生命总是吸纳灰尘才有重量,所谓的纯洁,也不过是浓郁之后的淡。《好儿女花》是一部大作品,它差不多洗掉了所有的脂粉,只剩下生活本来的模样。

而我们这些坐在剧场里等着演出开始的观众,又如何能体会到那世俗生活里包含的单纯与善意,挣扎与无奈。

新书品读

美国记者记录的《中国时代》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叶匡政

一部 100 万字的书,汇集了美国六大报刊对中国 100 年来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与评述。这些报刊多数人听了都会耳熟,如《纽约时报》《时代》,如《华盛顿邮报》《纽约客》和《新闻周刊》。它们是怎么说中国的?它们是如何看待那些对中国人来说,极其重要的历史时刻的?对喜爱历史的人,通过它,能换一个视角来重新观察那些重大事件。对不关心历史的人,它如同一部认知中国的历史小说,因为它有鲜活的细节,有让你觉得新奇的叙述口吻。这就是作家出版社新近出版的《中国时代 1900—2000》。

书中有很多妙趣横生的历史细节。比如说 1945 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,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,而飞机是蒋介石派出的。下机后,别人问他坐飞机的感受,毛泽东回答:“效率蛮高的嘛。”比如 1947 年 700 个大学生为抗议当时物价高涨,冲进了南

京总统府,结果竟冲进政府的饭厅,把官员们的午饭一扫而光。再如 1948 年美国记者采访镇守太原的阎锡山,问假如共产党攻进城怎么办?阎向记者展示了一个纸盒,里面有 500 小瓶氰化钾,阎锡山拿出三瓶说:“这是给我和家人准备的”。书中讲到 1970 年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总参谋长的黄永胜,也很有意思。美国记者观察到,他出席外交活动,要看着周恩来才知该站在何处。一次,一个外国来访者惊讶地发现,黄永胜虽穿着制服笔直地站在那里,裤角处却露出了蓝白条睡裤。像这些细节,国内历史书中很少出现,在这本书中却比比皆是。

这些史料肯定也会受到史学界的欢迎。从上个世纪末以来,历史学发生着最深刻的变化。对历史研究而言,那种只有一个权威说法的年代已逝去。人们通过越来越多的方法和途径来接近历史,历史学



《中国时代》
师永刚等主编
作家出版社
二〇〇九年十月

的领域也被一再扩大。

然而对历史的认知,从来就是人类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内容。只有通过历史,每个人才能从一个更为广大的人群中,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和认同感,明白自我与他人的差异。在每个国家的文化定位中,历史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,它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文化认同的最终形成。从任何角度说,一个国家如果缺乏或扭曲了对于历史的记忆,都是一件悲哀的事。这也是近年来民间史学热的一个真正动因,民众需要从历史中找到自己心灵的归属与认同。因为一个生命,只有从统一而连续的精神长河中,才能感到自己行动的价值。